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2年2月28日至4月1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年度报告

概要

在根据大会第 74/133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中，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阿拉·姆吉德概述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两年对儿童保护和儿童福祉的破坏性影响。报告阐述了一个实证案例，重点是投资于为儿童及其照顾者提供的强化和综合服务，强调了儿童作为变革推动者的关键作用。根据从这一大流行病和其他正在发生的危机——包括冲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报告概述了这种综合服务对于实现儿童免遭暴力的权利和加快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极其重要。这种投资为儿童、家庭和整个社会提供了很高的回报，并为在从这一流行病恢复期间和之后创建一个更可持续、公正、包容和有复原力的社会铺平了道路。



目录

| | 页次 |
|------------------------------------|----|
| 一. 导言..... | 3 |
| 二. 加快行动，到 2030 年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 | 3 |
| 支持成员国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4 |
| 三. 终止剥夺移民儿童自由的做法..... | 9 |
| 四. 儿童是变革的推动者..... | 11 |
| 五. 更好地投资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祉..... | 12 |
| A. 迫切需要：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有所增加，并变得不那么明显..... | 12 |
| B. 范式转换：从孤立的方法到强化的综合系统..... | 15 |
| C. 投资以产生预防暴力红利..... | 16 |
| D. 更大的投资：必要、可行和具有成本效益..... | 17 |
| 六. 展望未来..... | 19 |

一. 引言

1. 在本报告中，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回顾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开展的活动，并概述取得的成果。报告强调了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如何增加，但变得不那么明显。报告概述了为什么投资于强化的综合儿童服务对于实现《儿童权利公约》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至关重要。

2. 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这两年的大流行期间，家庭、社区和网上对儿童的暴力有所增加，有证据表明基于性别的暴力也相应增加。¹ 这一疾病的严重社会经济影响增加了童工、儿童性剥削、贩运和走私、童婚以及儿童加入犯罪和武装团体的风险。此外，冲突、粮食无保障、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政治不稳定造成的持续危机继续使儿童遭受多种形式的暴力。

3. 甚至在 COVID-19 出现之前，数据显示，世界上每年约有一半的儿童面临暴力。近 3 亿 2 岁至 4 岁的儿童经常遭受照顾者的暴力管教。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全世界 11 至 15 岁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受到同龄人的欺负，据估计，大约有 1.2 亿女童在 20 岁之前遭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接触。情感暴力影响到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儿童；四分之一的儿童与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母亲生活在一起。²

4. 暴力对儿童及其家庭具有破坏性的直接、终身和代际影响。暴力杀害儿童：2017 年，估计有 40,150 名儿童是凶杀案的受害者，占有所有凶杀案的 8.4%。³ 暴力损害儿童的大脑发育，严重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破坏他们的学习能力。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直接影响也给个人、社区和政府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儿童时期的暴力限制了个人成长到成年的发展，这种未实现的潜力的代价阻碍了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

5. 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努力进展太慢——必须加快这些努力。根据这一大流行病和其他危机的教训，现在必须将向所有儿童提供使其不受歧视地获得的综合和多部门服务视为在这一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更好地重建的一项关键投资。

二. 加快行动，到 2030 年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继续利用其任务，通过其宣传、咨询和桥梁作用，推动保护儿童免遭暴力。

¹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Amiya Bhatia 等人(2021 年)，“COVID-19 大流行期间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世界卫生组织月报》，第 99 卷，第 10 期，第 730-738 页。

² 世卫组织，《2020 年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状况报告》，可在以下网址参阅：<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violence-prevention/global-status-report-on-violence-against-children-2020>。

³ 同上。

支持成员国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7. 特别代表外联工作的关键是，在会员国为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筹备自愿国别评估时，她与会员国的密切接触。为支持这些努力，特别代表办公室制定了指导方针，说明他们如何利用自愿评估进程，确定和报告有希望的做法，以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2020 年，该办公室还编写了一份对国家评估的评价，以总结和分享在执行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及其驱动因素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主要主题、讯息和经验教训。⁴

8. 特别代表在 2021 年高级别论坛筹备进程的早期阶段会见了正在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 38 个会员国，鼓励它们采取综合办法，在整个 2030 年议程中预防和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及其驱动因素。她还强调了儿童作为这一问题的关键行为体的作用，并建议了支持儿童积极参与评估筹备工作的方法。

9. 此外，特别代表还动员了联合国系统在区域和国家两级的实体。在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驻地协调员和国家工作队的讨论中，她强调它们有共同责任支持各国政府将儿童权利纳入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的主流，包括保护儿童免遭暴力，并强调需要采取全面和综合的办法。特别代表还直接参与了若干会员国国家一级自愿国别评估的筹备进程。

10. 在高级别政治论坛筹备期间，特别代表办公室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组织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以评估在结束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6.2)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包括大流行病的影响。特别代表还参加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为筹备高级别政治论坛整合部分而组织的整合对话。

11. 高级别政治论坛的重点是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实现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恢复，该论坛是一个机会，可以藉此机会强调在大流行病期间在如何加强保护儿童免遭暴力方面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代表是主题为“我们如何走上建设更和平、平等和包容性社会的轨道”的小组讨论的主要讨论人，该小组讨论探讨了将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12. 特别代表办公室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还在高级别论坛上共同组织了一个“自愿国别评估实验室”，汇集了各国政府、联合国、儿童、青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探讨如何创建对儿童问题敏感和具有包容性的自愿国别评估。在实验室的讨论中，强调了需要优先投资于儿童社会服务综合系统。

13. 此外，在高级别政治论坛上，特别代表办公室和精神卫生与健康之友小组组织了一次高级别活动，强调迫切需要解决暴力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更好地重建，确保心理健康成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次活动期间，特别代表办公室根据一系列关于心理健康的视频发起了一场多媒体运动，来自所有区域 19 个国家的儿童分享了他们关于如何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最好地支持心理健康的经验和建议。

14. 在审查自愿国别评估和会员国在 2021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所作的介绍时，特别代表办公室确定了一些关键点。虽然会员国越来越多地采取综合办法来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但关于这种行动的信息没有一贯地纳入评估。此

⁴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content/2030-childrens-rights-agenda>。

外，虽然有更多的会员国报告在处理具体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不同形式的暴力(包括线上和线下)的相互关联性和共同发生性。虽然许多会员国在评估中强调弱势儿童的困境，但关于为确保保护和照顾他们而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有限。还谈到了联合国系统在国家一级采取全系统办法支持会员国编写评估报告的积极影响。⁵

15. 编写自愿国别评估的进程是一个让儿童作为变革推动者参与的机会。2021年的评估强调了会员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方式，包括：利用调查和民意调查征求儿童的意见和投入；与儿童组织面对面和网上重点小组；为儿童提供与决策者和国家立法机构接触的机会；并利用儿童议会和咨询委员会等现有结构。

16. 这些经验为特别代表办公室为会员国制定关于让儿童参与自愿国别评估进程的实用指南提供了参考。该指南强调需要将儿童定位为一个不同的年龄组，并让年龄较小的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它还建议各国政府在报告中纳入儿童的意见，优先与弱势群体儿童协商，以确保不让任何儿童掉队。⁶

17. 为强调迫切需要投资于综合和有效应对儿童在危机时期面临的暴力行为增加的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与儿童之友小组、可持续发展目标、欧洲联盟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共同主席合作，将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高级别会外活动。这次活动还受益于全球运动“谈谈儿童对工作的看法，现在还是时候”儿童咨询委员会代表的观点和建议。

18. 作为 2021 年世界儿童司法大会的共同组织者，特别代表利用多利益攸关方筹备进程和全体会议强调，需要重新思考促进儿童和儿童参与司法的作用，以满足最边缘化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并促进采取基于儿童权利的预防暴力办法，剥夺自由的替代办法以及可持续的康复和重返社会。大会通过了《儿童司法问题全球宣言》，这是一份与儿童联合起草的成果文件，其中概述了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应与儿童合作采取的行动，以创建满足边缘化儿童需要的框架、程序和服务，并确保他们在紧急和非紧急情况下公平诉诸司法的机会。

19. 在这些重要进程的基础上，并且基于与合作伙伴和专家的广泛协商，特别代表办公室制定了实用指南，确定了良好做法和儿童诉诸司法综合办法的关键组成部分。

20. 特别代表作为主旨发言人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2021 年世界反欺凌论坛，来自 40 个国家的 700 多名代表聚集在一起，分享不同学科和区域在解决欺凌问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论坛与会者提出了经修订的欺凌定义，不仅包括数字层面，而且包括文化和规范的作用，并强调需要采取参与性和包容性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让学校和社区参与进来。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为起草大会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欺凌的两年期决议提供了支持，该决议涉及欺凌对儿童心理健康和教育的负面影响。⁷ 这鼓励了会员国向遭受欺凌的儿童提供支持和咨询，并收集必要的数据库，以支持有效的预防和应对努力。

⁵ 同上。

⁶ 同上。

⁷ 大会第 75/166 号决议。

国家访问

21. 在国家层面的倡导仍然是特别代表工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特别代表除了持续的在线沟通外，还能够恢复亲自进行国家访问。

22. 应菲律宾政府邀请，特别代表于 2021 年 4 月对该国进行了虚拟访问。通过与相关部委领导人和利益攸关方的对话，特别代表帮助评估了在执行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国家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对话强调需要增加对儿童综合社会服务的预算拨款，并应对大流行病的潜在长期影响。

23. 2021 年 6 月，特别代表是尼日尔利亚结束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国家政策对话的主旨发言人，该对话总结了该国自 2017 年成为全球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中的领航国家以来取得的成就。这是一个机会，可藉此机会重申该国致力于确保每个儿童生活在有营养、有利和安全的环境中，包括通过执行 2003 年《儿童权利法》，确保普遍出生登记和投资于各种服务，保护受暴力影响的儿童。

24. 2021 年 7 月，特别代表与纳米比亚儿童议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她与大约 30 名儿童议员进行了鼓舞人心的互动对话。在这次会议之后，小议员们应邀加入了出席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国家代表团。

25. 2021 年 11 月，特别代表与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对尼日尔进行了国家访问。⁸ 访问的重点包括与以下人员和部门进行建设性对话：尼日尔总统；主要部长；全国人权委员会；议员；民间社会成员；传统和宗教领袖；儿童、青年和地方社区代表；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伙伴和捐助者的代表。还对尼亚美和马拉迪的服务和方案进行了实地访问。特别代表欢迎总统坚定承诺将教育作为国家优先事项，以此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和童婚。

26. 特别代表还与当地的联合国伙伴密切合作，于 2021 年 11 月对乍得进行了国家访问。⁹ 特别代表与下列人士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乍得总统和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主要部长；民间社会组织和宗教间平台的代表；外交界人士；捐助者；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代表；以及儿童和年轻女童网络。除一个拘留设施外，特别代表还访问了专门针对儿童的方案和服务，并参与发起了“Oranger le Tchad”全国运动，该运动与结束性别暴力全球运动保持一致。特别代表和联合国乍得国家工作队承诺与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开展包容各方和参与性的全国对话，作为新宪法起草进程的一部分，并确保儿童和青年参与其中。

27. 作为对乍得和尼日尔访问的后续行动，特别代表将继续在最高级别进行倡导，并与所有主要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向两个会员国提供支持，以确保儿童得到适当保护，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

28. 2021 年，特别代表与哥伦比亚第一夫人和一个高级别政府代表团举行了第三次会议，确定了将于 2021 年 12 月启动的《禁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罚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国家教育和预防战略》的合作方式和技术支持。会

⁸ 见 <https://niger.un.org/fr/160422-dr-najat-maalla-representante-speciale-du-secretaire-general-en-visite-au-niger-du-13-au-20>。

⁹ 见 <https://chad.un.org/fr/160603-visite-officielle-de-dr-najat-maalla-mjid-au-tchad>。

议还为特别代表于 2022 年初进行国家访问铺平了道路，以进一步支持哥伦比亚作为全球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中的领航国家所作的努力。

29. 特别代表计划与当地的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于 2021 年 12 月对约旦和黎巴嫩进行国家访问，目的是与主要利益攸关方举行对话，访问与预防和应对暴力有关的方案，与儿童和地方社区举行会议，动员决策者和伙伴投资于儿童及其照顾者的综合服务。特别代表还表示支持约旦将儿童权利纳入其 2022 年自愿国别评估的主流，并支持黎巴嫩加强努力，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加强协作和伙伴关系

区域组织

30. 特别代表继续与在区域一级开展工作的组织，特别是区域政府间组织接触，以促进儿童免遭暴力的权利。

31. 2021 年的一个亮点是特别代表办公室与非洲伙伴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该办公室的区域战略的基础是与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等非洲联盟区域机制密切合作以及确定该区域各级的主要伙伴，以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非洲 2040 年儿童议程：建设适合儿童生长的非洲》，以制止对儿童的暴力。该办公室与会员国和区域经济共同体接触，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活动在次区域一级的影响。

32. 2021 年 11 月，特别代表亲自参加了尼日尔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非洲女童峰会，主题是：“文化、人权和问责制——加速消除有害做法”。峰会汇集了来自非洲联盟 35 个成员国的代表、100 多名青少年和 1,500 多个利益攸关方。峰会使特别代表有机会与非洲联盟卫生、人道主义事务和社会发展事务专员、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与传统和宗教领袖进行对话，包括在峰会之前与儿童举行一次会议。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大力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消除有害做法的尼亚美行动呼吁和承诺”，作为峰会的成果。

33. 特别代表为导致 2021 年 3 月通过欧洲联盟儿童权利战略的协商作出了贡献，该战略将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作为其六个优先专题之一。特别代表还会见了欧洲联盟打击贩运问题协调员，探讨了在欧洲联盟内外开展重点是制止贩运儿童的联合宣传的可能性，包括通过欧洲联盟、特别代表和非洲联盟之间的三角合作。此外，特别代表继续大力参与欧洲委员会的工作，并支持执行其《儿童权利战略(2016-2021 年)》，其中也包括将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34. 特别代表继续加强与会员国和中东和北非区域主要伙伴的合作。与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协作是特别代表关于该区域内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 3 月，特别代表在阿拉伯自愿国别评估实验室期间和在作为 2021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一部分而组织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会议上向阿拉伯各国政府致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还继续加强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促成商定了一套 2021 年和 2022 年的联合优先活动。

35. 特别代表办公室广泛参与了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为期五天的终止东亚和太平洋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区域会议。会议由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共同主办，汇集了来自 25 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实体、区域机构、民间社会、青年网络和学术界的与会者。会议的一个关键支柱是确保儿

童和青年广泛参与活动的各个阶段，包括筹备工作。特别代表直接与儿童与会者接触，将其建议纳入她对出席会议的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倡导之中。

36. 2021 年 10 月，特别代表参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观察站的启动，该观察站收集和分析来自 13 个国家的关于以下问题的官方数据：早孕；童婚、早婚、强迫婚姻和结合；性别暴力。报告强调了各国为提高对加强保护女童免遭有害做法的认识和证据所作的努力。这一举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该区域各国之间创建共同做法，分享经验教训，并制定方法，以加强相关的、准确的、可靠的和分类的国家和地方数据。¹⁰

联合国系统

37. 特别代表继续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协作，以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为指导，在人权、发展、和平与安全等各个支柱中促进将儿童权利纳入主流和保护儿童免遭暴力。

38. 作为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机构间工作组主席，特别代表继续促进联合国各实体分享信息、采取联合行动和统一方法，以防止和处理所有环境中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39. 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的合作特别重要，这一合作已就关键问题产生了几项联合声明。特别代表办公室加入了机构间网络“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并担任其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工作组主席。2021 年 10 月，特别代表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缅甸各方立即停止一切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包括招募、使用、杀害和残害儿童，不断袭击学校和医院，任意拘留儿童。

40. 特别代表特别关注贩运儿童的增加，并加入了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以便通过综合和协调的办法加强打击这种犯罪的努力。

41.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和特别代表办公室联手探讨儿童的网上参与，包括儿童如何利用网上手段进行保护，例如点对点支持。它们召集了一个由联合国各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提供关于不同区域在线求助热线和支助系统的信息。该小组将确定和传播儿童和青年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以加强对他们的保护，使他们免受暴力侵害，并就如何利用和扩大这些系统提供指导。

42. 特别代表还支持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组织的#YouthLead 创新节，主办了一次关于数字安全和网上暴力的聚焦会议，以青年为对象，并确定促进其健康和福祉的良好做法。

民间社会和信仰组织

43. 特别代表继续通过季度会议与民间社会组织和信仰组织接触，这些会议提供了机会，交流关于全球民间社会举措的信息，并探讨在日内瓦和纽约的民间社会行为体之间就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开展合作的机会。

44. 特别代表办公室和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签署了一份合作书，以促进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2021 年世界童子军会议和网上大露营“JOTA-

¹⁰ 见 https://plan-international.org/latin-america/virtual_event_facts_dont_lie。

JOTI”期间，特别代表强调了童子军作为变革推动者的关键作用。2021年10月，特别代表办公室和世界组织在大会期间共同组织了一次会外活动，以促进以基于权利的办法保护儿童，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体育组织和儿童参加了这次活动。

45. 特别代表与感恩国际合作，支持“穿我的鞋”运动，动员儿童和成人，包括宗教领袖、决策者、家长/照顾者和教育工作者，协助儿童重返学校，并解决COVID-19大流行期间学校关闭的影响。该运动通过儿童主导的播客直接与儿童接触，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平台，分享他们的经验，并就他们安全返回学校进行对话，优先考虑他们的社会、情感和精神福祉。

三. 终止剥夺移民儿童自由的做法

46. 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的儿童在流动。据儿童基金会称，到2020年底，全世界已有3,300多万儿童被迫流离失所；占全球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儿童，几乎占世界难民的一半。¹¹ 在其旅途的各个阶段，流动儿童面临更高的暴力风险和其他不利的童年经历，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福祉。虽然这种情况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已经很严重，但目前的挑战更大。

47. 流动中的儿童，首要的是他们是儿童，他们的权利必须与他们一起流动。拘留儿童永远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一种侵犯其权利的暴力形式。然而，移徙儿童继续在100多个国家被拘留。¹² 必须防止对他们的拘留，并促进基于权利的替代办法，特别是考虑到移徙、流离失所、贩运和走私的增加。

48. 特别代表继续领导联合国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工作队，并与其他伙伴合作，以结束与移民有关的拘留并促进替代办法。在她的领导下，工作队将2021年的儿童移民拘留列为优先事项。¹³

49. 工作队抓住全球进程提供的机会，将这一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包括在2021年高级别政治论坛上(该论坛评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移民问题的具体目标10.7¹⁴和具体目标16.2)以及在正在进行的对《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全球难民契约的执行、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中。2021年10月，工作队与哥伦比亚、摩洛哥、葡萄牙、泰国和土耳其合作，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高级别会外活动，以加快关于儿童移民拘留问题的行动，并动员会员国为2022年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做好准备。¹⁵

50. 特别代表加强了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伙伴的合作，包括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及其拘留替代办法工作组和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随着工作组的投入，特别

¹¹ 见 <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migration-and-displacement/displacement/>。

¹² 见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videos/therearealternatives-immigration-detention-children>。

¹³ 以支持大会第74/133号和第75/185号决议。

¹⁴ 见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7，其中促请各国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民和人员流动，包括通过执行有计划和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

¹⁵ 见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upload.teamup.com/908040/E3jw9R02RAa2MvsQLKdy_SIDE-20EVENTconcept-20note-20-2015-20Oct.-202021.pdf。

代表在与 2021 年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接触时强调，迫切需要终止儿童移民拘留。

51. 鉴于许多有希望的做法可以效仿和推广，结束移民儿童拘留是紧迫的，也是可行的。特别代表承认迄今取得的进展，60 多个国家现在已有成功的替代办法。¹⁶ 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¹⁷ 拘留替代办法工作组、¹⁸ 儿童基金会¹⁹ 和国际拘留问题联盟²⁰ 以及特别代表办公室广泛记录了其中许多做法。

52. 各国正在通过禁止拘留移民儿童的立法和政策。²¹ ²² 它们正在制定具有包容性、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移民政策，将移民儿童纳入国家儿童保护系统，²³ 包括监护²⁴ 和寄养，²⁵ 并为儿童获得证件，包括临时签证和居留提供便利。²⁶ 它们还努力增加儿童获得住房、²⁷ ²⁸ 教育、保健、司法以及儿童和社会保护服务的机会，²⁹ 以加强跨国儿童保护机制，³⁰ 采用非拘禁和基于社区的替代办法，最重要的是，确保移民儿童从拘留中获释。³¹ ³² 特别代表强调，最成功的政策是整合社会的、基于权利的、使移民儿童本身参与其中的政策。

¹⁶ 见 <https://id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There-Are-Alternatives-2015.pdf>。

¹⁷ 见 A/75/183。

¹⁸ 见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docs/annex_to_policy_brief_on_atd_and_covid-19.pdf。

¹⁹ 同上。

²⁰ 见 <https://id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Covid-19-Briefing-Paper-2020-ENGLISH.pdf>。另见 <https://endchilddetention.org/solution/there-are-alternatives>。

²¹ 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爱尔兰、日本、肯尼亚、巴拿马、南非和土耳其以及中国台湾省和南美洲国家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没有正式批准《2019 年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的全球研究报告》所确定的拘留，pp.445-484。

²² A/75/183, 第 37 段：在厄瓜多尔，《人员流动法》禁止对儿童进行移民拘留，并保障对父母或照顾者的人身自由权的保护，如果维持家庭团聚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则为家庭实施替代办法。

²³ A/75/183, 第 48 段：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芬兰、德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墨西哥、挪威、菲律宾、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²⁴ 德国和挪威(《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第 484 页)。

²⁵ A/75/183, 第 49 段：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希腊、荷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²⁶ 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塞浦路斯。

²⁷ 加拿大正在其两个最大的省份实施住房倡议，使各机构能够将个人转移到这些设施。

²⁸ A/75/183, 第 43 段：乌克兰立法规定，寻求国际保护的难民和其他个人有权与亲属一起住在旅馆、租用的房舍或难民临时住宿中心。

²⁹ 爱尔兰和西班牙(《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第 485 页)。

³⁰ 南非：跨界合作和禁止儿童移民拘留。

³¹ 在肯尼亚，当地社区提供寄养，并利用部族追踪机制帮助家庭团聚；在赞比亚，移民被分流，允许移民身份正规化而不再借助于拘留的报告增加；在突尼斯，卡法拉被用来照顾没有家庭的儿童；例如，保加利亚和加拿大指派社会工作者陪伴移民儿童。其他例子包括比利时、捷克、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以及中国香港。

³² A/75/183, 第 39 段：2018 年，印度尼西亚制定了一项政策，承诺不应再拘留难民，包括与家人在一起的儿童和无人陪伴或失散儿童，而是允许他们在庇护所或社区住宿中心独立生活。

四. 儿童是变革的推动者

53. 在打击暴力的努力中，儿童正在担当变革的推动者。事实上，从整个 COVID-19 大流行可以看出，儿童不仅在采取行动解决暴力问题，而且他们往往领导这种行动。

54. 儿童正在支持他们的社区和同龄人，与决策者联系，并联络其他难以接触的儿童。儿童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同伴行动，自这一流行病的最早期阶段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加强，无论是能力建设和知识转让，还是通过发展同伴支助网络，如下例所示。

55. 在柬埔寨，街头儿童、工作儿童和父母已移民的儿童与其他青年和地方当局联系，通过柬埔寨儿童与发展组织创建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帮助儿童提高在儿童权利、解决冲突、非暴力解决问题办法、数据收集和报告)帮助减少针对儿童的暴力。这些儿童然后教育其社区的其他儿童。

56. 在加纳，在天主教街头儿童行动的支持下，儿童正在利用戏剧、诗歌和舞蹈使人们认识到许多街头儿童面临的贫困和虐待。其目的是让社区、教会组织和传统领袖参与打击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斗争。

57. 在印度，由地球社支助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制定以艺术为基础的项目，以解决虐待儿童、童工、童婚、不安全移民和两性不平等问题。他们在社区倡导消除消极的社会规范，并与儿童保护责任承担者合作举办联合活动，以提高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认识。教育儿童如何报告暴力或童婚案件，以及如何将其同伴与转介、求助热线和支助服务联系起来。

58. Tremendas México 网络由少女领导，重点是通过从小教育和增强在校女童的权能，解决性别暴力和童工问题。其活动包括为女童和男童举办关于健康和福祉的培训方案，如“健康就是生命”，对青少年进行心理、性和生殖健康教育，并解决性别陈规观念。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就一系列问题与儿童直接联系，从心理健康和同龄人之间交流方法，以及借助于女童、童工和街头儿童的努力，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暴力。特别代表还参加了由儿童主导的代际对话、网络研讨会和播客，讨论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增加以及在与大流行病有关的儿童教育中断后重返学校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问题。

60.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特别代表办公室支持“Zoom a tus derechos”，这是一个区域竞赛，鼓励儿童提交关于族裔和种族歧视的音乐录影带。特别代表办公室根据儿童的创造力和赋能讯息，帮助挑选获奖视频。特别代表办公室还与智利的“儿童监察员”和倡导儿童有意义地参与起草新宪法的不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接触，并参加了关于儿童参与的重要性的技术访谈和网络研讨会。宪法起草者促进了儿童，包括弱势社区儿童的积极参与，以确保没有人掉队。

61. 连续第二年，特别代表办公室继续支持#CovidUnder19，这是一项由民间社会组织主导的倡议，有 30 多个全球伙伴参加，采用儿童主导的宣传和基于权利的办法。2021 年，该倡议为经历过能力建设进程的儿童启动了一个同伴辅导方案，辅导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一批儿童，以促进以儿童为主导的宣传，重点是将儿童纳入国家的更好地重建计划。

62. 特别代表办公室将继续确定、扩大和提高儿童作用的能见度，作为结束暴力解决办法的一部分。³³ 特别代表还将继续直接接触儿童，作为其任务的核心部分。

63. 甚至在大流行病之前，世界各地的儿童就越来越多地成为积极变革的推动者。然而，尽管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创建和加强了让儿童参与决策进程的途径，但他们参与和介入的障碍仍然很大。这些障碍包括关于他们对其有影响的决定中的发言权问题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以及他们因其激进主义的直接后果而面临暴力风险。特别是，无法上网或来自贫穷和边缘化群体的儿童仍然缺乏表达自己意见和参与这些进程的机会。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消除这些障碍，为儿童提供安全和增强权能的途径，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成为积极变革的推动者。孩子不仅仅是未来，也是现在，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五. 更好地投资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祉

A. 迫切需要：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有所增加，并变得不那么明显

64. 关于 COVID-19 大流行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之间联系的证据显示了一幅严峻的画面：在这一大流行发生两年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有所增加，但变得不那么明显。

65. 对现有研究的审查表明，家庭暴力和与暴力有关的伤害增加，但暴力侵害儿童的报告较少。随着暴力增加，正常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从学校到儿童保护服务”——因封锁和关闭而中断，使儿童失去了重要的支助网络。这些调查结果反映了关于大流行病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突出了这两种暴力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³⁴

66. 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估计，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全球有130多万儿童因 COVID-19 而失去至少一名父母或监护祖父母：孤儿面临遭受暴力的严重风险。³⁵

67. COVID-19 还创造了一个助长有害心理健康的环境，³⁶ 加剧了对整整一代儿童心理健康的现有关切。³⁷ 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封闭和隔离、增大的压力和焦虑以及更大的经济困难的损害。儿童自己也在寻求帮助：他们在与特别代表直接接触期间，将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福祉视为一个主要关切问题。国际儿童求助热线还表示，暴力和心理健康是拨打成员求助热线的主要原因，2020年全世界的求

³³ 见 A/HRC/46/40。

³⁴ 见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46154/>。

³⁵ 见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1\)01253-8/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1)01253-8/fulltext)。

³⁶ 同上。

³⁷ 见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state-worlds-children-2021>。

助电话增加了 25%。³⁸ 然而，世卫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是大流行期间中断最严重的服务之一。³⁹

68. 大流行病揭示并加剧了已经影响到最贫穷和最弱势儿童的社会不平等。大流行病对已经贫穷的家庭的影响是可怕的，特别是对那些无法获得社会保护的家庭而言；到 2020 年底，可能又有 1.42 亿儿童陷入经济贫困。⁴⁰ 然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全世界只有 26.4% 的儿童获得社会保护福利，用于儿童社会保护的全国平均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⁴¹

69. 这些影响包括童婚风险增加，儿童基金会估计，今后十年，由于大流行病，还将有 1,000 多万女童有可能成为童养媳。⁴² 世界宣明会对四个区域国家数据的分析显示，童婚、饥饿、教育和父母支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地区都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调查前四周经历过饥饿的儿童结婚的可能性比没有经历过饥饿的儿童高 60%，没有上学的儿童结婚的可能性是仍在上学儿童的 3.4 倍。⁴³

70. 日益严重的贫困和教育的丧失可能会加剧已经日益扩大的童工规模。据儿基会和劳工组织称，全世界从事童工的儿童人数已增至 1.6 亿——过去四年增加了 840 万儿童——全球进展 20 年来首次停滞不前。由于大流行病，已经从事童工的儿童可能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条件不断恶化，更多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可能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被迫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儿童基金会和劳工组织警告说，到 2022 年底，全世界还有 900 万儿童面临被推入童工的风险。⁴⁴

71. 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贩运儿童进一步转入地下，增加了估计其规模和采取有效对策的挑战。在一些区域和国家，国内贩运儿童的现象有所增加，儿童越来越多地成为地方一级和网上贩运者的目标。还有证据表明，对儿童性剥削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加剧了全世界对儿童的剥削。⁴⁵

72. 两年的大流行病重塑了儿童面临的在线风险：虽然在封锁下，面对面的欺凌可能有所减少，但网络欺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所增加，研究指出，网上骚扰、仇恨语言和剥削越来越多。⁴⁶ WeProtect 全球联盟最近的一项威胁评估发现，COVID-19 造成了一场“完美风暴”状况，助长了全球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的上

³⁸ 见 <https://www.childhelpline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Voices-Covid-19.pdf>。

³⁹ 见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redirect/978924012455>。

⁴⁰ 见 <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poverty/covid-19/>。

⁴¹ 见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orld-social-security-report/2020-22/lang--en/index.htm>。

⁴² 见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covid-19-a-threat-to-progress-against-child-marriage/>。

⁴³ 见 https://www.wv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COVID-19%20and%20child%20marriage_v3.pdf。

⁴⁴ 见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child-labour-2020-global-estimates-trends-and-the-road-forward/>。

⁴⁵ 见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human-trafficking/2021/The_effects_of_the_COVID-19_pandemic_on_trafficking_in_persons.pdf。

⁴⁶ 见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77433/pdf/BLT.20.283051.pdf>。

升。⁴⁷ 同时，大流行病凸显了数字鸿沟的影响，根据儿基会和国际电联的数据，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在家中无法上网。⁴⁸ 这限制了他们的可见度、获得学习材料和参与社会；此外，还剥夺了为他们的保护而建立的在线服务。

73. 并非所有群体都能均匀地感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它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加剧了获得服务的挑战，使在大流行病爆发前已经更加边缘化和容易遭受暴力的儿童，包括女孩、残疾儿童、土著儿童、难民、流离失所和移民儿童、在街头生活或工作的儿童、接受替代照料的儿童和被拘留的儿童，面临更大的风险。

74. 人道主义危机，包括与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有关的危机，继续助长暴力、流离失所和经济毁灭。大流行病对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基本服务造成了更大的挑战。然而，与此同时，正如人道主义行动中保护儿童全球联盟 2020 年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用于紧急情况下保护儿童的资金有限。⁴⁹

75.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挑战，大流行病已经表明，通过政治意愿、创新和充足的资源相结合，可以取得并迅速取得成果。解决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有希望的做法包括，使用虚拟平台与儿童和家庭沟通并提供服务。⁵⁰ 许多国家开通了儿童求助热线，并创建了筛选和优先处理高危儿童电话的机制。加强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缓刑执行官的国家网络，为儿童和家庭服务。各国还找到了确保司法和法律服务连续性的创新方法，包括通过庭审视频会议等方式保障受犯罪侵害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诉诸司法的机会。⁵¹ 儿童基金会报告说，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有 45,000 多名儿童从拘留中获释，至少有 84 个国家的政府和拘留当局采取了替代措施和(或)暂停任何新的收容。这清楚地证明，只要有意愿，就可以找到和调动有利于儿童的司法解决办法。⁵²

76.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大流行病的头 9 个月，至少有 8,000 亿美元投资于社会保障，惠及 11 亿多人，占世界人口的 14%。⁵³ 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相比，现金转移福利几乎翻了一番，覆盖面增加了 240%。

77. 虽然现在评估 COVID-19 大流行病对儿童的全面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人们担心，在预防暴力方面取得的进展可能过于脆弱，无法承受这场危机。恢复正常是一个过于狭隘的抱负，因为在大流行病爆发前的正常情况是，未能以结束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所需的规模和速度取得进展。

⁴⁷ 见 <http://www.WePROTECT.org/global-threat-assessment-21/>。

⁴⁸ 见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youth_home_internet_access.aspx。

⁴⁹ 见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pdf/stc_still_unprotected_repport_high_sg.pdf。

⁵⁰ 见 <https://inspiringchildrensfutures.org/blog/learning-report-challenges>。

⁵¹ 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92261/file/Access-to-Justice-COVID-19-Learning-Brief-2021.pdf>。

⁵² 见 <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more-45000-children-released-detention-during-covid-19-pandemic-evidence-child>。

⁵³ 见 <https://blogs.worldbank.org/developmenttalk/game-changer-social-protection-six-reflections-covid-19-and-future-cash-transfers>。

B. 范式转换：从孤立的方法到强化的综合系统

78. 现在需要的是转变，在强化的和充分综合的儿童服务的基础上，重建得更好。权利案确立已久，人人皆知：每个儿童都有免遭暴力的基本权利。现在可以通过以下证据来加强这一点：对儿童综合服务进行投资的好处，以及即使这种投资略有增加也会产生的经济回报。

79. 大流行病不仅加强和突出了范式转换以结束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迫切需要，而且还表明，改变是可能的，可以迅速发生，如果有意愿，就可以找到资源。

80. 现在是采取有效和可持续的全球对策应对暴力侵害儿童危机的时候了，重点是在所有相关部门为儿童提供综合和强化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儿童保护、保健、教育、司法和社会保护，并向儿童提供从幼年到成年的支持，包括支持其照顾者。这符合人权理事会的呼吁：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创建全面的儿童保护制度，包括通过适当的预算拨款，并确保所有社会部门都能获得服务，以不受歧视地满足所有儿童的多重需求和潜在的脆弱性。⁵⁴

81.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改变孤立的工作方式，以创建一种综合的生命周期办法，反映儿童权利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关联和不可分割的性质。这意味着将儿童权利纳入所有相关政策、方案和做法的主流，并改变心态，将对儿童的投资定位为基于其权利的一项法律义务，并将其优先化为一项健全的经济战略。

82. 这种转变将符合秘书长关于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作为全球大流行病后复苏的一部分的呼吁。⁵⁵ 它还将支持在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进展，该议程旨在创建公正、保护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使所有儿童免受伤害，不让任何人掉队。它将实现人权理事会提出的愿景：对儿童的公平、持续和基础广泛的投资为公正社会奠定了基础，⁵⁶ 它对包容性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并为社会和整个经济带来惠益。⁵⁷ 这种办法还将立足于安理会对各国的以下鼓励：它鼓励各国在其预算和支出中优先考虑儿童，以此确保有限的现有资源获得尽可能高的回报。⁵⁸

83. 正如 2021 年世界银行报告《投资人力资本促进有复原力的恢复：公共财政的作用》所强调的，在各国力图从大流行病中恢复之际，公共财政在建设和保护人力资本方面至关重要。⁵⁹ 在儿童基金会 2021 年报告《为儿童的包容性复苏筹资：行动呼吁》中，儿童基金会还提出了在公共支出中优先考虑社会部门的理由，即使面临大流行病造成的潜在经济衰退和财政挑战。⁶⁰

⁵⁴ 见人权理事会第 28/19 号决议。

⁵⁵ 见 <https://www.un.org/en/desa/un-chief-calls-%E2%80%98new-social-contract%E2%80%99-part-post-pandemic-recovery>。

⁵⁶ 见人权理事会第 28/19 号决议。

⁵⁷ 见人权理事会第 34/16 号决议。

⁵⁸ 见人权理事会第 28/19 号决议。

⁵⁹ 见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5840>。

⁶⁰ 见 <https://www.unicef.org/documents/financing-inclusive-recovery-children-call-to-action>。

84. 为解决 COVID-19 造成的儿童贫困加剧和缩小社会保护覆盖差距，劳工组织建议决策者采取综合系统办法，包括儿童福利和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育儿假和获得保健的机会。⁶¹

C. 投资以产生预防暴力红利

85. 特别代表办公室、儿童基金会和一些民间社会组织最近委托进行的研究概述了投资于儿童的有力理由。这项研究汇集了目前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代价和对预防暴力行为进行有效投资所带来的好处。

86. 研究证实，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代价很高。暴力造成的年轻生命损失或无法修复的伤害有充分的记录，但决策者也需要明确的证据，证明暴力对经济造成的代价以及投资于预防暴力的好处。

87. 暴力不仅给儿童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损失，而且给政府预算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儿童暴力对健康的影响给国家卫生系统带来沉重负担，而教育、社会福利和司法系统必须处理暴力、虐待和忽视儿童的后果。

88. 由于小时候经历过暴力的成年人生产力的损失，经济受到阻碍，这种人力资本的侵蚀可能破坏所有其他以儿童为重点的投资。暴力减缓经济发展，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扼杀经济增长，降低人均收入，导致暴力和贫穷的恶性循环。

89.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全球经济代价难以估计，但研究表明，这种代价是巨大的。海外发展研究所和儿童基金联盟 2014 年的一项研究估计，费用高达 7 万亿美元，近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

90. 各国政府需要带头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这包括提供充足的预算，为预防和应对暴力方案提供资金。虽然关于政府在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案和在更一般的儿童保护方案方面的支出数据很少，但显然这种支出很低。

91. 《2020 年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全球进展报告》列出了 155 个国家在解决这一暴力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⁶² 结果显示，80%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但其中只有不到 25% 的计划得到充分资助。在执行方面，在低收入国家实施的 11% 的预防方案中和在实施的 5% 的应对服务中得到了惠及所有贫困儿童所需的支助，所举出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金。

92. 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个用来估算儿童保护支出的标准化方法，《儿童保护财务基准手册》(2020 年)概述了这一方法。⁶³ 在编写手册的过程中，在阿富汗、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尔利亚进行的试点研究证实，政府在儿童保护方面的支出水平较低，从尼日尔利亚在 2013-2014 年每名儿童 1.27 美元到科特迪瓦在 2014 年支出 4.18 美元不等。⁶⁴

⁶¹ 见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17574/lang--en/index.htm。

⁶² 见 <https://www.who.int/news/item/18-06-2020-countries-failing-to-prevent-violence-against-children-agencies-warn>。

⁶³ 见 <https://www.unicef.org/rosa/reports/financial-benchmark-child-protection>。

⁶⁴ 见 <https://mokoro.co.uk/project/financial-benchmark-for-child-protection-in-nigeria/>。

93. 所有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都是可以预防的，其经济代价也是可以避免的。对预防暴力进行投资并在发生暴力时作出适当反应，将带来一系列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可统称为预防暴力红利——一种为现在、未来成人生活和下一代儿童带来利益的红利。

D. 更大的投资：必要、可行和具有成本效益

94. 加大对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投资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可行的，即使是小幅增加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相对少量增加拨款将大大改善儿童保护服务的规模和可得性。例如，尼日尔利亚的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将政府总支出的 0.1% 重新分配给儿童保护，儿童保护总支出就会增加 63%。⁶⁵ 在蒙古，儿童保护支出从 2017 年占政府合并支出的 0.12% 增加到 2020 年的 0.264%，结果，儿童保护支出增加了 239%。⁶⁶

95. 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预算规划应考虑到承担这些费用的多个部门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广泛经济成本和后果，应与预防暴力方面的有效投资所产生的成本和巨大的潜在节省相称。

96. 非暴力的积极影响是分层级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累积的，因为后来的神经、身体和发育方面的成就建立在没有暴力的安全、有保障和有培育的童年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事实上，投资于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是一项公共政策举措，不仅促进平等和社会正义，而且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97. 具体而言，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干预措施，特别是针对儿童早期的干预措施，可以获得很高的回报。例如，对幼儿发展方案的研究表明，一项将中低收入国家学前入学率提高到 50% 的方案，最佳情况下的效益成本比为 1:17。⁶⁷ 这已被用来推动世界各地政府增加对幼儿发展方案的支出，所有这些方案都强调需要支持积极、非暴力形式的养育方式。同样，为防止童婚而对生活技能教育和青年信息中心的投资提供的效益成本比为 1:21。⁶⁸ 所有这些方案都是各国政府的合理投资，是解决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98. COVID-19 大流行和随后的疫苗开发证明了预防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成本效益。对综合预防服务的投资可被视为应对暴力侵害儿童全球危机的一种“疫苗”。有许多具有成本效益的预防干预措施，提供了在有效证据基础上建立的有希望做法的例子，如下例所示。

⁶⁵ A. Folscher and I. Mackenzie, “A financial benchmark for child protection: Nigeria study”, 2018, UNICEF.

⁶⁶ C. Barberton and others, “Analysis of child-focused budgets and expenditure in the social sectors in Mongolia”, 2021, UNICEF Mongolia (unpublished).

⁶⁷ P.L. Engle and others,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inequalities and improving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young children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2011, *The Lancet*, vol. 378, No. 9799, pp. 1339–1353.

⁶⁸ B. Rasmussen and others, “Evaluating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child marriage in India”, 2021, *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Reports*, vol. 5.

99. 冰岛 2021 年初通过的立法旨在通过将满足儿童需求的服务综合一体来改善儿童的生活。⁶⁹ 该立法跨越三个法案。第一项法案提出了一项综合儿童服务的计划，将儿童服务分为基本、有针对性和专门服务。向所有儿童提供一名协调员，帮助他们获得所有基本服务。如果儿童需要更多支持，将提供一名个案经理，以创建一个支持团队，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其他法案设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国家儿童和家庭局和国家福利监督局。对这些立法变革的成本影响的评估得出结论认为，成本不会有实际变化，积极影响将是直接的，从 2070 年起每年将有 9.6% 的回报。

100. 2015 年，蒙古政府开始起草《儿童保护法》。为支持这一进程，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计算了法律草案的费用，包括使用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规划中产生的信息。2015 年《儿童保育服务法》以及 2016 年通过的《儿童保护法》和《儿童权利法》为提供全面的儿童保护服务创建了一个框架。在《儿童保护法》颁布之后，成本计算研究成为讨论执行该法所需资金水平的一个框架，也是衡量政府儿童保护服务预算的一个基准。从 2018 年起，政府大幅增加儿童保护服务支出。儿童保护服务开支的增加为加强服务提供和在中期取得更好的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⁷⁰

101. 生活技能教育方案从印度奥兰加巴德农村开始，然后扩展到普纳市，为 12 至 18 岁的少女提供为期一年的课程，她们面临童婚的风险较高。对该方案的评价发现，该方案中只有 9% 的少女在 18 岁之前结婚，而对照组的女童有三分之一在 18 岁之前结婚。⁷¹ 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地区村庄的青年信息中心为青年人提供了相互接触和了解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有关问题的机会。该方案总共创建了 72 个中心，为近 47,000 名年轻人提供服务。对该方案的评估表明，没有参加这些中心的女童对照组在童年时期结婚的可能性是参加中心的女童的 10 倍。⁷² 一项研究发现，这两个方案每投资一美元，总共产生约 17 美元的投资回报。⁷³

102. 根据基金组织关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童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减少童婚将大大提高增长：如果今天结束童婚，这些国家的长期人均增长将增加 1.05 个百分点。⁷⁴ 世界银行关于童婚对经济影响的全球综合报告估计，到 2030 年，结束童婚可为全球带来 5,660 亿美元的福利。⁷⁵

⁶⁹ 见 <https://www.coe.int/en/web/children/-/integrated-support-services-to-boost-wellbeing-of-children-will-pay-off-in-the-future-says-icelandic-minister>。

⁷⁰ C. Barberton and E. Gunchinsuren, "Budget analysis and costing of the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in Mongolia", 2016, Ulaanbaatar, UNICEF Mongolia.

⁷¹ 见 <https://www.icrw.org/files/images/Delaying-Age-at-Marriage-in-Rural-Maharashtra-India.pdf>。

⁷² 见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8-5586-3>。

⁷³ 见 <https://vuir.vu.edu.au/42137/1/23619-evaluating-interventions-to-reduce-child-marriage-in-india.pdf>。

⁷⁴ 见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0/02/08/Does-Child-Marriage-Matter-for-Growth-49011>。

⁷⁵ 见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530891498511398503/economic-impacts-of-child-marriage-global-synthesis-report>。

103. 2021年11月，非洲儿童政策论坛发起了“投资非洲儿童的经济理由：投资于我们共同的未来”，以促进增加对儿童的投资，⁷⁶ 这有力地证明了对儿童投资的经济效益和回报，并突出了政府政策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进展。报告强调，进展取决于“涉及粮食安全、保健、教育、生计、社会保障、护理做法、性别规范以及水和卫生等多部门干预措施的复杂互动”。这份报告加强了投资论点。例如，在教育方面，它援引的研究表明，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的所有女童都完成中学教育，童婚可能下降64%。对包容性社会和对儿童问题敏感的社会保护系统的投资将有助于解决非洲的儿童贫穷问题，现金转移和学校供餐方案在消除儿童贫穷、饥饿和排斥(这些往往与暴力有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04. Bolsa Familia 是巴西最重要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社会福利方案。该方案针对人均月收入低于140巴西雷亚尔(雷亚尔)的国家贫困线的家庭，向每个达到最低入学门槛的接种疫苗儿童的家庭提供32雷亚尔的月津贴。研究发现，入学要求，以及津贴数额大于从事劳动的儿童通常赚取的数额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是，领取津贴家庭中童工发生率大大减少，并将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了0.8年。⁷⁷ 对类似方案的其他研究发现，与这些现金转移支付挂钩的条件减少了经济冲击对儿童上学的影响，因为这些条件限制了家庭为缓冲这种冲击而对童工的依赖。⁷⁸ 在全球范围内，上学作为现金转移支付的一个条件通常减少了童工的参与。⁷⁹

105. 在儿童基金会和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儿童赠款更具成本效益，对贫穷儿童更有好处，可产生更好的儿童成果。其后，突尼斯政府已将低效燃料补贴资金用于儿童社会保护。作为COVID-19对策的一部分，政府减少了燃料补贴，并实施了临时现金转移支付措施，目标是至少623,000个有子女的家庭。⁸⁰

106. 许多其他会员国正在制定或加强综合国家政策和筹资框架，对儿童的保护和福祉给予特别注意。特别代表将继续收集这些做法，并与会员国分享。

六. 展望未来

107.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是一种大流行病，它破坏了儿童权利的实现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景。这种“大流行病”早在COVID-19之前就已经破坏了数百万儿童的生活，而且由于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实行的两年限制和封锁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儿童基本服务的破坏，这种“大流行病”更加恶化。除

⁷⁶ 见 <https://africanchildforum.org/index.php/en/economics-and-child-rights>。

⁷⁷ A. De Brauw and others, “The impact of Bolsa Familia on schooling: girls’ advantage increases and older children gain”, 2014,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⁷⁸ A. De Janvry and others, “Can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serve as safety nets in keeping children in school and from working when exposed to shocks?”, 2006,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9, No. 2, pp. 349–373.

⁷⁹ C. Ravetti, “The effect of cash transfers on child labour: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rural contexts”, 2020, Geneva, 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

⁸⁰ 见 <https://www.unicef.org/media/103276/file/UNICEF-Financing-An-Inclusive-Recovery-For-Children-Call-To-Action.pdf>。

了 COVID-19 大流行病之外，冲突、粮食不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政治不稳定造成的持续危机也继续使儿童遭受多种形式的暴力。

108. 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刻不容缓。距离履行《2030 年议程》的承诺只剩下八年时间，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更好地重建，必须被视为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以便在所有情况下预防和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109. 对综合预防服务的投资应被视为应对暴力侵害儿童“大流行病”的一种“疫苗”。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综合服务不仅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病发生和结束后更好地重建的全球努力的基础，而且对于创建能够抵御未来冲击的公正和有复原力的社会也至关重要。

110. 综合服务支出必须被视为一种投资，尽管大流行病造成了财政限制。这些并非只是额外成本：它们为儿童、家庭和整个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回报。除了从广泛角度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预防和应对暴力举措具有有效性，关于综合服务在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加强了综合服务的投资理由。

111. 投资理由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并辅之以充足的财政资源、人员充足的服务、循证行动、强有力的信息和监测系统以及强有力的问责机制。

112. 这需要广泛和可持续的动员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联系起来，让所有行为体参与进来，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组织 and 信仰组织、宗教领袖、私营部门、联合国系统、金融机构、媒体和技术公司、地方社区、捐助方以及儿童和青年。儿童作为当前和未来的变革推动者，必须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